

# 关于《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 第二版(一、二册)讹误的校正

段千千

[摘要]《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全四册)是一部对于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性工具书。笔者在阅读使用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也发现了一些讹误。本文对笔者阅读该书一、二册时发现的讹误进行了查对、校核,并按照名称、时间、期(卷)次、内容4个方面对这些讹误进行纠正。

[关键词]《毛著编年》;讹误;校对

[中图分类号]K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6)06-0097-08

《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sup>①</sup>(以下简称《毛著编年》)汇编了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开发表出版为主的毛泽东单篇著作的各种版本,共4册。其系统丰富的内容对于毛泽东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该书第1版出版后,毛著收藏家奚景鹏先生曾根据自己的收藏指出过一些讹误<sup>②</sup>。但笔者在阅读该书第2版1949年以前的部分(一、二册)时,仍发现了一些讹误。这些讹误会对一些使用者产生误导,造成研究的不便,有指出的必要。因此笔者对自己在阅读该书时发觉的一些讹误,对照原始资料、相关的馆藏资料目录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有关著作等资料,分作名称、时间、期(卷)次、内容4个方面予以了校核和纠正,在此就教于该书作者及学界前辈。

## 一、名称讹误

笔者在阅读《毛著编年》时发现该书存在着文章题名、出版者、书名、报纸名等名称讹误的现象,于是查找资料进行了校核、纠正(在校核中为了保证准确性,又由于一些原始资料无法接触,因此就借用了网上旧书店相关资料的图片):

书中第45页“‘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根据书中的版本查阅1920年9月5日的湖南《大公报》(影印本)题名为《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毛著编年》中的题名多了一个“小”字。

书中第125页《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查收录此文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234页)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此文的,题名为《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再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1931年6月28日记,此信是写给周以栗和谭震林的。《毛著编年》中的题名将“周以栗”写成了“周以粟”,系字误。

书中第250页《致白劳德》,《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38年1月,解放民族社编印的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第1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版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sup>②</sup> 详见奚景鹏《〈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中的讹误》,《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

《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查《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第46页《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是由民族解放社于1938年出版的<sup>①</sup>。《毛著编年》中此书的出版者错误。

书中第280页《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所写,与“抗战以前”相矛盾。查阅《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个人部分》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下简称《中档资料》)第456、457页:此文收录于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编印的《抗战以来选集》第一集(原书超星可查)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所以《毛著编年》中的书名错误。

书中第373页《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中央统战部1949年8月编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献》,收入此书时题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查阅《中档资料》第481页《中共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收录于中共中央统战部1949年8月编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重要文献》<sup>②</sup>中。《毛著编年》中的书名漏了“政权”两个字。

书中第423页《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晋察冀日报1944年5月编印的《毛泽东选集》(卷1)”。根据《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第45页: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5月编印了《毛泽东选集》(1-5卷)。《毛著编年》将出版者中的“日报”误写成了“门报”。

书中第465页《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东北1948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卷3)”。根据《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第46页:1948年5月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6卷合订本)。再查原书(超星可查),《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确收录于此书第3卷。《毛著编年》中的出版者漏了“书店”两个字。

书中第465页《组织起来》,《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4年1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编印的《组织起来——陕甘宁晋绥边区关于运动文献》”。从旧书网上提供的资料图片<sup>③</sup>可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1944年1月编印的是《组织起来——陕甘宁晋绥边区关于生产运动的文献》,且此文收录于该书。《毛著编年》中的书名漏了“生产”与“的”3个字。

书中第562页《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晋察冀边区及张市各界追悼‘四八’烈士筹委会1946年4月25日编印的《追悼“四八”烈士纪念册》”。根据《中档资料》第516、517页可知:晋察冀边区暨张市各界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筹委会于1946年4月25日编印的是《追悼“四八”遇难烈士纪念册》,而且查原书图片<sup>④</sup>确是如此。《毛著编年》中的编者、书名均漏了“遇难”两个字。

书中第708页《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1949年4月编印的《四个必读文件》”。查《中档资料》第525、526页,此文收录于1949年4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翻印的《四个必读文件》,而且查看原书图片<sup>⑤</sup>确是如此。《毛著编年》中的书名漏了一个“四”字。

书中第734页《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胶东区党委1948年5月25日编印的《胶东通讯》第3期”。根据《中档资料》第531、532页,胶东区党委1948年5月

① 原书具体信息可在此网页 [http://www.gucn.com/Service\\_CurioStall\\_Show.asp?Id=2105348](http://www.gucn.com/Service_CurioStall_Show.asp?Id=2105348) 上看到。

② 此书的具体信息可在此网页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162668\\_278511786/](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162668_278511786/) 上看到。

③ 图片可在此网页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25054\\_353024682/](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25054_353024682/) 上看到。

④ 此书的具体信息可在此网页 [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301\\_8341413.html](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301_8341413.html) 上看到。

⑤ 图片可在此网页 [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4\\_3528627\\_0.html](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4_3528627_0.html) 上查看。

25日编印的《胶东通讯》第3期<sup>①</sup>发表了此文。《毛著编年》将刊名中的“通讯”写成了“通讯”。

书中第739页《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粟裕兵团暂不渡江华中主力在中原歼敌》为题,将其编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查该版本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92页),此文的题名为《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所以《毛著编年》中将此本题名中的“集中”误写成了“华中”。

书中第747页《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打确有把握的仗》,《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查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出版社是战士出版社。《毛著编年》将出版者中的“战士”写成了“战士”。

书中第769页《给海外侨胞团体的复电》,《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8年10月5日出版的《嫩江日报》;第782页《为吴化文起义的慰勉电》,《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也是1948年10月25日出版的《嫩江日报》。《嫩江日报》曾经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办的,在1946年4月被中共嫩江省工委接管,并于当年5月改名出版《新嫩江报》,同年10月终刊;另一种是1959年中共嫩江县委发行的《嫩江日报》。可见1948年不存在可以发表中共文章的《嫩江日报》。1947年10月10日中共嫩江省委又出版《嫩江新报》为机关报,于1949年5月终刊<sup>②</sup>。查阅《中档资料》第538页和541页,这两篇文章均发表在《嫩江新报》,日期分别是1948年10月5日和25日。所以《毛著编年》中的报纸名称错误。

书中第778页《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8年11月7日出版的《新洛阳日报》。但是根据《〈新洛阳报〉出版始末》<sup>③</sup>,1948年洛阳解放后,洛阳地区发行的是《新洛阳报》而不是《新洛阳日报》。再查阅《中档资料》第539、540页,此文发表于1948年11月7日出版的《新洛阳报》。所以《毛著编年》中的报纸名多了一个“日”字。

书中第842页《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学》第5卷”。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是《毛泽东军事文集》,并且此文也收录在该书第5卷中。所以《毛著编年》中的书名将“文集”误写成了“文学”。

## 二、时间讹误

《毛著编年》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毛泽东著作及其版本的,不仅要明确建国前毛泽东文章的写作时间,而且也要明确它们的版本的时间,因而难免不出现讹误:

书中第65页《给文运昌的信》暑期11月1日。但是根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下同)1922年11月1日并无毛泽东给文运昌写信的记述,而1922年11月11日记有此文。且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9页)根据手稿刊印此文,暑期也是1922年11月11日。《毛著编年》中显系暑期错误。

书中第13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载于1931年12月1日

<sup>①</sup> 此书具体信息可在此网页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56538\\_337920768](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56538_337920768) 上看到。

<sup>②</sup> 参见胡连顺《嫩江县志》,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第608页;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50·报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sup>③</sup> 胡次元《〈新洛阳报〉出版始末》,《洛阳日报》2008年4月4日。此点并可参看吴锡恩《中国解放区报业图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54页。

《红色中华》,第2版’。《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所以此文不可能发表于1931年12月1日的《红色中华》。查《红色中华》创刊号(影印本,下同)第2版确有此文发表。《毛著编年》中显系发表日期错误。

书中第173页《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署期1934年7月。此文是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记者的采访谈话。根据发表此文的1934年8月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可知毛泽东接受采访的时间是1934年7月31日,因此文章的成文时间也应为7月31日。并且收入此文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51页)署的日期也是7月31日。所以《毛著编年》中的署期不完整,此文应有具体时间1934年7月31日。

书中第235、237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两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版本是“《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10月第1版”。查建国后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原书,版权页标明出版的时间是1951年10月。所以《毛著编年》中的出版时间错误。

书中第251页《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工作》署期为1937年7月15日。但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1937年7月15日并没有关于此文内容的记述,而在7月16日记有此文。再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页)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此文,题名为《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署期7月16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署期错误。

书中第259页《矛盾论》,《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51年4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查此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电子版,下同)并未发现《矛盾论》一文,但在1952年4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找到此文。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写错了年号。

书中第270页《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署期为1937年10月5日。查阅《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4页)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此文,署期10月6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署期错误。

书中第346页《我们要团结——在欢迎中央慰问团暨中央政工团晚会上的欢迎词》署期1939年9月11日。查首次发表此文的193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华报》(影印本)可知,中央政工团晚会召开于9月10日晚上,毛泽东也是在此时致的欢迎词,并且从报道中可知中央慰问团在11日早上离开延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也是在1939年9月10日记述此事的。所以此文的正确时间应是1939年9月10日,《毛著编年》中显系署期错误。

书中第385页《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署期为1940年9月5日。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在1940年9月5日并无此文的记述,而在9月6日记有此文。《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8页)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此文,署期9月6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署期错误。

书中第401页《致萧三》署期1941年1月9日。《毛著编年》注明此文的一个版本是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查该书(第263页)系根据手稿刊印此文,署期1941年1月29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署期错误。

书中第443页《历史教训》,《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2年1月1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但是查1942年1月1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影印本,下同)并没有发现此文。而在1942年10月1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中找到了此文。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发表日期错误。

书中第493页《为悼念邹韬奋逝世题词》,《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4年11月15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但在1944年11月15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未找到此题词,而在1944年11月2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中找到了此题词。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发表日期错误。

书中第514页《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

“1945年6月17日的《解放日报》曾摘要刊载”。查1945年6月17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并未找到此文,而在1945年6月19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中找到此文。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发表日期错误。

书中第631页《扩大战果再歼孙震一部》暑期11月14日。但是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1946年11月14日并无此文的记述,而在11月20日记有此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63页)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此文,暑期11月20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暑期错误。

书中第631页《致何凯丰》暑期11月20日。但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1946年11月20日并无此文的记述,而在1946年11月14日记有此文。再查收录此文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259页)根据手稿刊印此文,暑期1946年11月14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暑期错误。

书中第727页《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中央政研室编辑、东北局1948年5月5日印行的《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政策汇编》”。此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根据《中档资料》第529页,《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政策汇编》<sup>①</sup>是由中共中央政研室编,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9年5月5日印行。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此书的出版年份错误。

书中第877页《电贺丹麦文豪涅克索80寿辰》,《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9年6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但查1949年6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并未发表此文,而在1949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此文。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发表月份错误。

书中第880页《悼念季米特洛夫逝世》暑期为1949年7月4日。《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第3版发表了此文,但在文末暑期是1949年7月3日。而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也是在7月3日记述此文的。所以此文的写作时间应为1949年7月3日,而不是7月4日,《毛著编年》显系暑期错误。

书中第897页《祝贺加香八十寿辰》,《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9年9月1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但查阅1949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并未发现此文,而在1949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中找到此文。因此《毛著编年》中显系发表日期错误。

### 三、期(卷)次讹误

毛泽东建国前的一些文章意义重大,多次发表在刊物上,被收入书籍中,版本众多。《毛著编年》在整理这些版本信息时出现了时间虽正确,但期次和卷次错误的现象:

书中第86页《关于宣传决议案》,《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26年4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第4期”。查阅《政治周报》第4期(超星可查)没有找到此文。但在1926年4月10日出版的第6、7期合刊中找到此文,而且第4期的出版时间是1926年1月10日。因此显系《毛著编年》中的期次错误。

书中第90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在《战士》周报上连载,首先是1927年3月5日的“第35、26期合刊”。35与26期合刊不合常理,查阅《战士》周报(超星可查),湖南战士社1927年3月5日出版的是35、36期合刊发表了此文的一部分。所以《毛著编

<sup>①</sup> 此书的具体信息可在此网页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683\\_282700396/](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683_282700396/)上看到。

年》中显系期次错误。

书中第242页《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第150期”。根据《中档资料》第444页，1937年6月13日发表此文的《救国时报》是第105期而不是150期（原件国家图书馆可查）。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期次错误。

书中第271页《〈农村调查〉序言一》，《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毛泽东文集》第1卷收录毛泽东的文稿到1937年6月，而此文的写作日期是1937年10月6日，因此不可能被收入第1卷。查《毛泽东文集》第2卷收入此文。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卷次错误。

书中第343页《必须制裁反动派》，《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39年8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82期。《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下称《红藏》）收录的《解放》第5册第1页上注明1939年8月20日出版的《解放》是第81期，且此文也收录于此期，题名为《用法制裁反动分子——在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演》。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期次错误。

书中第367页《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卷2）”。此文在收入建国后《毛泽东选集》之前的题名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查阅《中档资料》第479页：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收入此文<sup>①</sup>。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卷次错误。

书中第372页《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东北书店1948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卷3）”。查东北书店1948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六卷合订本（超星可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收在此书的第2卷，不在第3卷<sup>②</sup>。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卷次错误。

书中第406、408页《没有调查者没有发言权》（《农村调查》序言二）和《〈农村调查〉跋》的一个共同版本是“收入新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查新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并没有收入这两篇文章，而是收录在新版《毛泽东选集》的第3卷中，系《毛著编年》中的卷次错误。

书中第508页《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是《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暑期1945年4月24日，第512页《愚公移山》的写作时间是1945年6月11日，第523页《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写作时间是1945年8月13日，第602页《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写作时间是1946年8月6日，第69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写作时间是1947年10月10日，第735页《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写作时间是1948年4月2日，第765页《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写作时间是1948年9月20日。《毛著编年》中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版本是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但是《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收录毛泽东著作的时间到1940年底，因此这些文章未被收录在此册。而收录毛泽东1940年以后著作的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册次错误。

书中第546页《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此文的写作时间是1945年11月3日，但是《毛泽东文集》第3卷收录毛泽东著作的时间到1945年8月，因而此文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第3卷。再查《毛泽东文集》第4卷，此文确收于此。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卷次错误。

<sup>①</sup> 关于这点内容可参见张占斌、蒋建农：《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第2~3页。

<sup>②</sup> 关于这点内容可参见张占斌、蒋建农：《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附录第4页。

书中第637页《新年祝词》，《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7年1月13日出版的《群众》第14卷第1期。《红藏》收录的《群众》第13册第401页注明1947年1月13日出版的《群众》是第14卷第2期，且此文也发表于这一期，题名为《毛泽东同志新年祝辞》。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期次错误。《群众》第14卷第1期的出版时间是1947年1月7日而不是1月13日。

书中第778页《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著编年》注明其一个版本是1948年11月11日出版的《群众》第2卷第4期。《红藏》收录的《群众》第17册第437页上注明1948年11月11日出版的《群众》是第2卷第44期，且此文也收录于这一期。所以《毛著编年》中显系期次错误。《群众》第2卷第4期出版于1948年2月5日。

#### 四、内容讹误

《毛著编年》中除了以上所列名称、时间、期(卷)次等方面的讹误外，还存在着内容介绍有误，文章题名与内容介绍不符等问题。

书中第165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二电》，此文最先发表在1934年2月14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后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题名为《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此书第12页注题解“这是代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起草的致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电报”。由此可得此文并不是毛泽东的文稿，而是周恩来的文稿。笔者认为此文虽是周恩来起草的，但是是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表的，因此在收入时，应注明是周恩来代写的<sup>①</sup>。此外电文内容中是向十九路军提出了6条建议，而《毛著编年》中说是5条建议，内容介绍也有误。

书中第856页：有一条题名是《给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的复电》，暑期1949年4月13日，但是紧随的内容介绍却与此题名完全不符。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1949年4月13日的记述，毛泽东在此日先是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在北京进行的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毛泽东提出了在进入正式谈判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已收录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题名为《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但是《毛著编年》未录。再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关于国共和谈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的新闻稿<sup>②</sup>，其内容与《毛著编年》中1949年4月13日条的内容介绍是一致的，所以《毛著编年》1949年4月13日收入的应是此新闻稿。此文发表于1949年4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题名为《就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判进入正式阶段》。至于《给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的复电》此文写于1949年7月21日，发表于1949年7月2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毛著编年》在1949年7月21日条目中也录入此文。

《毛著编年》在收录和完善毛泽东著作版本时，有些收录有毛泽东著作的书未录完全：例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只是过录其前17册中的毛泽东著作，第18册基本没有过录《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只是详细地校录了上编，下编关于几大战役的电报都未得到详细校录。这一方面使本书收录毛泽东的文稿不够全面，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文章的版本不够全面，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漏。

《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一、二册)中的这些讹误，是笔者在阅读使用中发现的，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这些讹误有的是原始资料查找不到位造成的，有的是信息核对不准确造成的，有的是后期校对不仔细造成的。讹误虽有，但瑕不掩瑜。在内容如此丰富，查找校对量如此大的著作

<sup>①</sup> 关于这点内容可参见：周一平《日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与研究》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中,出现讹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以使此书更加完善完整,使它更好地为学术服务,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服务。

(本文作者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硕士生 湖南 411105)

[责任编辑:俞放]

### 《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要目

#### 古路新生与民族复兴

——从“一带一路”建设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张宏志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与鲜明特点	徐永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姜淑萍
习近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丰富和发展	王丛标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同向发力的论述及意义	赵士刚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	
——习近平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层意蕴	杨明伟
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	秦程节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蕴含的毛泽东农村治理思想论析	尹胜
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的六次“交换意见”	肖建平
论陈云在红军长征中的独特作用	迟爱萍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主要举措	王在亮 房晓军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研究	侯竹青
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1949-1956)	崔丹
长征时期林育英一封电报的时间考辨	郭晓勇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创作的一首七律政论诗	吴正裕